

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歷史評析 與發展思考

吳廷俊*

《摘要》

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發展至今已有 80 餘年的歷史。從規模上看，80 多年來，中國的新聞教育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如果從教育模式的角度看則變化不明顯——從誕生至 20 世紀九〇年代前期只是單一的傳統模式。中國新聞教育傳統模式的形成與新聞教育機構的負責人、教員和新聞學研究有密切關係，與中國新聞實務強烈的政治性也有一定的關係。中國新聞教育傳統模式的缺陷主要是學術底蘊不足，科技含量不足，因此培養的人才缺乏後勁，也缺乏使用現代高科技傳播工具的能力。20 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中國新聞教育界開始新模式的探索——導入傳播學以增加學術底蘊，導入自然科學以增加科技含量。中國新聞教育在今後一個時期將有以下變化：單一的傳播模式被打破，出現多元化格局；「中文系辦新聞學專業」和「中文系教師教新聞學課程」的傳統作法受到衝擊。

關鍵詞：新聞教育、模式、歷史與發展、中國大陸

投稿日期：2001 年 9 月 10 日；通過日期：2002 年 2 月 7 日。

* 作者現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院長、教授；E-mail: tjwu@hust.edu.cn

中國大學正規新聞教育的歷史最早可以追索到 20 世紀初。1920 年上海聖約翰大學成立的報學系是中國大學第一個新聞教育機構。從那時算起，至今已有 80 餘年的歷史。

80 餘年中國新聞教育發展的情況如何？方漢奇教授以 1949 年為界將其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分為「萌芽」、「發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三個階段；後期分為「調整」、「文革」、「成長」三個階段）（方漢奇，2000: 257-296），趙玉明教授則將 80 年中國新聞教育分為「逐漸起步」（1918-1949）、「曲折前進」（1949-1978）和「迅速發展」（1978-1998）三個時期（趙玉民，1999）。兩位先生都是從辦學規模上看問題的，所以他們對中國新聞教育的歷史分期大同小異，觀點沒也大致相同。

筆者以為，學校教育的發展，除了辦學規模的擴大以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模式的變化。辦學規模擴大是形式變化，教育模式變化才是本質變化。這裏所說是「模式」，是指一種固定的程式；一種「教育模式」，就是從培養目標到教學重點、教學方法、教學環節都大致相同，並且相對穩定。如果從教育模式的角度看待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發展，則大致可以以 20 世紀九〇年代中期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單一的傳統模式，後期開始走出傳統模式，探索新的教育模式。

壹、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傳統模式的歷史回顧

自 1920 年上海聖約翰大學成立報學科——中國高等學校正規新聞教育開元，隨後廈門大學、平民大學、法政大學、燕京大學、復旦大學、滬江大學、中央政治大學等學校先後建立新聞系科，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北平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申報新聞函授學校、蘇州新聞專科學校、重慶建國新聞專科學校等先後開學，蘇南新聞專科學校、華中新聞專科學校等校相繼建立。據已經掌握的史料，到 1949 年，中國先後創建了 59 個新聞教育機構（方漢奇，2000: 257-259）。雖然這 59 個新聞教育機構的辦學主體各不相同，但教育模式卻基本相同，都是「以培養應用性人才為目的，以新聞知識與技能的教育訓練為教學重點」（丁淦林，1997: 70）。

首先反映在培養目標上。1924 年成立的燕京大學新聞系說：「本學系之目的在培養報界人才。」（方漢奇，2000: 261）1928 年創建的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的辦學目的是為新聞界培養新生力量，重點培養外勤記者。復旦大學新聞系 1929 年成

立時宣佈該系的培養目標是「養成本國報館編輯人才與經營人才。」1933年，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創辦時，確定的辦學目的是：「改進中國新聞事業，及訓練手腦並用之新聞人才。」（張友鸞，1982：142）新聞事業家史量才為「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制定的培養目標是：「以養成管理與編輯地方報紙人才，訓練採訪新聞通訊技能為宗旨。」（《申報》，1933年1月5日）

其次反映在教學內容上。各個系科的課程設置，操作層面的術理性課程在專業課程中佔有絕對的優勢。

1923年，由徐寶璜先生創辦的平民大學新聞系，4個學年共開設專業類課程15門，其中操作層面的術理性課程有：速記法、新聞採集法、新聞編述法、廣告、照相製版述、新聞評論法、戲劇評論法、新聞經營法、出版法、採編實習、評論實習等11門，占專業課程總數73%，其中兩門實習課開2個學年。而學理類課程僅有新聞學概論、新聞事業發達史、群眾心理和新聞學選讀（英文）等4門，占專業類課程總數的23%。

1929年成立的復旦大學新聞系，學制4年，共開設專業34課程，其中操作層面的課程有新聞採訪、評論寫作、通訊練習、速記法、新聞儲藏法、新聞編輯、新聞照片製版等17門，占專業類課程的50%。

1943年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4年制課程基本上也大致如此。必修的新聞專業類課程有：新聞學、新聞文學、採訪編輯、新聞英語、中國新聞史、世界新聞史、報業管理、出版法、社論寫作、編輯實務等10門，操作層面的課程有6門，占60%。

至於報人和媒體獨立創辦的新聞教育機構，操作層面的術理性課程所占的比重更大。比如顧執中先生的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制定課程設置時，明確規定，以採訪、編輯、時事分析和攝影等課程為主。

第三，反映在教學環節上。各個教學機構均注重實踐，重視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不要說那些媒體和報人獨立創辦的中專性質的或者夜間上課的新聞教育機構給學生很多的實踐機會，就是一般大學創辦的新聞系也十分注重業務實習，安排較多的時間和通過較多的方式使學生在學習期間就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和參與新聞實踐，在實踐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為了便於學生實習，不少院系還創辦了通訊社和實習報刊，如聖約翰大學新聞系創辦了《約大周刊》，燕京大學新聞系創辦了燕京通訊社和《平西報》、《燕京日報》、《燕京新聞》、《新中國月刊》，南方大學新聞系創辦了南大通訊社，復旦大學新聞系創辦了復旦通訊社和《復旦五日刊》，北

平新聞專科學校出版了《新專晚報》，民國大學新聞系創辦了民國通訊社、政治大學新聞系創辦了《中外月報》、《南溫泉周刊》，社教學院新聞系出版了《新社會報》（方漢奇，2000: 266-26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政權對新聞教育進行調整。一方面合併或撤消了原有的新聞院系，一方面新建了一批新聞院系，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全國有新聞系科專業 14 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幾乎完全陷於停頓，1978 年後逐漸恢復並有所發展。到 1982 年，全國新聞系科專業的數量基本上達到了「文革」開始之前的規模。1983 年 5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家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建國以來第一次全國新聞教育工作座談會，分析了新聞事業發展的形勢和對新聞人才的需求，作出了大力加強新聞教育工作的決定。1984 年中國新聞教育學會成立。從此，中國新聞教育事業在規模上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據童兵在《中西新聞比較論綱》中所言，到 1989 年，全國的新聞教育機構猛增到 51 個，到 1996 年，經過國家教委批准備案設有新聞類本科專業的普通高校共 55 所，專業點 88 個，加上各省市教委批准備案的，共計超過 120 個。師資隊伍有也隨之擴大，1996 年全國新聞專業教師人數超過 1000 人，其中教授超過 100 人（童兵，1999: 284-285）。

雖然辦學規模上有了很大發展，但是教育模式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基本上仍然是前一時期的傳統模式。在培養目標上，除了復旦大學新聞系六〇年代在表述中加上了「新聞教學和研究人員」外，其餘系科依然是單一的為新聞界培養應用性的專門人才；在課程設置上，新聞操作類的課程仍然是各院系專業類課程的重頭戲。1953 年，北京大學新聞學專業成立，必修課中，新聞專業類課程有 6 門，29 學分：新聞學導論（3 學分）、新聞採訪和寫作（6 學分）、報紙編輯（6 學分）、評論文寫作（6 學分）、中國新聞事業史（4 學分）、外國新聞事業史（4 學分）。雖然學理類課程和術理類課程都是 3 門，但是內容比重的差距很大，學理類 11 學分，占專業課學分的 38%；術理類 18 學分，占專業課學分的 62%。

復旦大學新聞系六〇年代由於培養目標有所變化，課程設置中學理性課程便有所增加。在 7 門新聞專業類課程（35 學分）中，學理性課程占了 4 門，19 學分，術理性課程 3 門（新聞採訪、寫作、編輯合併成一門課），16 學分。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調整後的課程設置中，必修的新聞專業類課程有所增加，為 10 門，30 學分，但其中學理類課程則只有 4 門（新聞事業概論、新聞理論、中國新聞事業史、外國新聞事業），10 學分，占專業課學分的

33%；術理類課程 6 門（寫作基礎、新聞採訪、新聞協作、報紙編輯、報紙評論寫作、新聞攝影），20 學分，占專業課學分的 67%。

在教學環節上，更加強調業務實踐。六〇年代，復旦大學新聞系要求每屆學生應有半年時間在基層辦報，半年時間在省市一級的報社實習；人民大學新聞系規定每屆學生在校期間應有三次業務實習，一次在北京市內的基層工礦企業報實習，為期 4 周，一次在地區報、中等城市報紙或縣報實習，為期 7 周，一次到省級或直轄市級報社實習，為期 21 周，八〇年代後，業務實習仍然是各新聞系安排教學的重要環節，華中理工大學新聞系將學生實習列入教學計劃，每屆學生除一次小實習（4 周）、一次大實習（一學期）之外，還要求 4 年實習不斷線，每次寒暑假都給學生佈置實習任務。

貳、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傳統模式的理性分析

一、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傳統模式的成因分析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大陸新聞教育單一傳統模式的成因何在？

第一，與新聞教育機構的負責人和教員有密切關係。1949 年以前，中國新聞教育機構的負責人和教員多數都是新聞實務界中人，他們在新聞實踐過程中深感中國的新聞業的水平有待提高，而新聞業水平的提高，必須改變從業人員的素質，培養出一批有較高新聞業務能力的人員，因此，媒體與學校連手，甚至媒體獨立創辦新聞教育機構成為一時的風氣。中國現代新聞界的全才邵飄萍非常熱心新聞教育，1918 年與蔡元培、徐寶璜共同發起創辦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為中國新聞教育的拓荒者之一，在 20 年代又先後在平民大學、政法大學創辦過新聞教育，始終主講新聞採訪課程。中國新聞史學的奠基人戈公振先生在自己的新聞實踐中認識到新聞教育的重要性，1927 年至 1928 年他到歐洲、美洲和日本考察報業時，也很關注那裏的新聞教育，回國後，著文《新聞教育之目的》，專門評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新聞教育。他不僅在大學創辦新聞系，而且擔任數家新聞教育機構的教學任務。長期擔任《新聞報》外勤記者的顧執中先生，在 1985 年撰文談到他創辦著名的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的動機時說：「在實踐中，我愈來愈感覺到新聞教育的重要，許多新聞工作者老化了，許多新聞工作者的思想與能力遠遠趕不上祖國形勢的發展，在祖國那時的新聞戰線上，必須有新的生力軍的支援。」（顧執中，1985: 146）

中國著名的新聞事業家、《申報》老闆史量才深感報業的發展，根本在於人才的養成，「我國今後之新聞事業，既必將隨時代之邁進，而益趨發展，則我國新聞界今日責任之重可知。此實力如何，即新聞人才之養成是也」，「在不久之將來，此種需要必將日益加增，若不事先養成，必不足以應付將來。」（《申報》，1934）於是，創辦「申報函授學校」，親自擔任校長。在已知的 59 個新聞教育機構中，學校獨立創辦的只有如燕京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等極少的幾家，其餘絕大多數是報人與學校連手或報人、媒體獨立創辦的，其中報人或媒體獨立創辦的有 30 餘個，占一半以上。

各新聞教育機構都紛紛聘請新聞實務界的能人任教。不僅媒體獨立創辦的新聞教育機構如此，各大學創設的新聞系也是如此。燕京大學新聞系成立後，就有胡政之、張季鸞、成舍我等人前來講課；復旦大學新聞系成立後，系主任謝六逸就先後聘請陳佈雷、戈公振和黃天鵬到校任教。當時，一批著名報人如胡政之、張季鸞、成舍我、陳佈雷、戈公振、黃天鵬、汪英賓、張友漁、薩空了、左笑鴻、嚴獨鶴、潘公展、郭步陶、顧執中、俞頌華、董顯光、曾虛白、趙敏恒等都先後到新聞教育機構任過教，擔任過課程。

中國這種報人辦新聞教育的傳統直到八〇年代依然或多或少地保持。五〇年代，幾個大學新聞系的領導人，大都是從解放區來的「老新聞」。如復旦新聞系主任王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安崗，北京大學新聞學專業主任羅列，杭州大學新聞系主任江牧岳，北京廣播學院第一任院長周新武等。

由於中國新聞教育的負責人和教員多為新聞實務界中人，他們自身沒有系統學習過新聞傳播學的理論，只是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因而他們的教學內容多為一些經驗的傳授，很少上升為理論的講授。比如邵飄萍在幾個大學教授採訪學，主要是他自身採訪經驗的傳授，他還根據講義撰寫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該書被稱之為中國採訪學的奠基之作。該書名為新聞學專著，實際上只是一些採訪方法的介紹，故又名《新聞材料採集法》，分「外交記者之地位」、「外交記者之資格與準備」、「外交記者之外觀的注意」、「外交記者之工具與雜藝」、「訪問之類別與具體方法」、「訪問時之種種心得」、「外交記者之分類」、「探索新聞之具體方法」、「新聞價值測定之標準」、「新聞價值減少之原因」、「裸體新聞應記之專案」、「原稿之外觀的注意」、「原稿內容之注意點」、「余白」等 14 章。該書的內容基本上都是作者本人採訪經驗的介紹和具體案例的分析。

第二，中國新聞教育的傳統模式與新聞學研究有密切關係。科研水平有多高，教學水平就會有多高，任何一門學科研究和教學的關係都是如此。即使屬於應用性學科的新聞學，也是如此。

中國新聞學的研究情況怎麼樣？實事求是地講，我國新聞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還很不深入。歷史新聞學研究比較系統，應用新聞學研究比較全面，理論新聞學研究亦有成就。由於對新聞內容的過分關注，新聞史往往成了政治鬥爭史，缺乏對新聞史自身發展規律和特點的研究；應用新聞學的研究基本上是新聞業務操作層面的做法介紹，上升到理論性闡述文章和論著較少；理論新聞學研究差距更大一些，不僅還沒有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就是一些基本概念都還比較混亂。由於新聞學一直囿於人文學科範疇，受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太嚴重，所以我國出版的理論新聞學著作，大都是關於媒介功能（主要是政治宣傳功能）的闡述、新聞工作（黨報的新聞宣傳工作）基本原則的論述，和新聞事業（以黨報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基本性質的論述，對新聞本體的研究涉及得很少，就是談到新聞價值這樣多少與新聞本體有聯繫的命題時，也是從時新性、重要性、接近性、顯著性和趣味性等實際操作層面去闡述，僅僅是向讀者介紹一些選擇新聞的具體做法。理論新聞學研究的缺憾，使得新聞學作為一門學科也就缺乏應有的學術底蘊，當然也就使得新聞學作為一門學科缺乏自己完整的學科體系。由於中國新聞學研究尚未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中國新聞教育當然也就不可能達到學理教育的高度，只能停留在術理教育和技能訓練的層面。科研狀況的侷限使得教學出現「無學理課程可教」的局面。

第三，中國新聞教育傳統模式與中國新聞實務強烈的政治性也有一定的關係。從遠一點講，中國在 19 世紀七〇年代到 20 世紀初就形成了政治家辦報的傳統。既然是政治家辦報，理所應當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自然而然地按政治鬥爭的要求辦報，尤其是政黨報刊，作為政黨之喉舌，更應按政黨的要求辦報。在實際運作中，服從宣傳紀律的作用勝過遵從新聞規律，一系列規章制度雖然有效地保證了黨性原則的貫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聞工作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久而久之，在人們心目中便形成了一個錯覺，似乎幹新聞不需要什麼理論，甚至什麼學問，似乎誰都可以幹新聞。因此，新聞教育機構也就降低了自己的培養標準，只滿足與對學生操作層面的技能訓練。在教學過程中，把一些報刊工作原則當成理論講授，名曰為理論課，實則無理論深度，出現教師對理論課缺乏信心、學生對理論課缺乏興趣的不正常現象。

二、中國新聞教育傳統模式的得失分析

中國新聞教育傳統模式的優點，總起來說就是「短平快」，即人才培養的周期短（幾門專業業務課一年多就可以學完，甚至只要稍通文墨者經過幾個月短訓班學習也可以畢業），成本低（不需要什麼投入，也不需要特別的師資），見效快（畢業生走上工作崗位上手快，立馬可用）。但是，中國新聞教育傳統模式的缺陷也是明顯的，主要是學術底蘊不足，科技含量不足，培養的人才缺乏後勁，缺乏使用高科技傳播工具的能力。

長期以來，爲了增加新聞教育的學術底蘊，不少人只有「找學理課程而教」。

1949 年以前，中國新聞教育爲了增強學術底蘊，主要到文史哲、政經法各學科廣泛「找學」。那時，新聞院系的課程設置中，新聞學專業的課程並不多，而相關學科知識性的課程不少，大有喧賓奪主之勢。如 1923 年，由徐寶璜先生創辦的平民大學新聞系 4 個學年共開設的 38 門課程中，相關學科知識性課程有：經濟學、政治學、文學概論、哲學概論、民法概論、中國文學研究、憲法、文字學、社會學、財政學、中國近代政治外交史、平時國際公法、統計學、時事研究、現行法令綱要、戰時國際公法、中國近代財政史、現代金融論、近代小說、現代各國政治外交史、現代社會問題、近代戲劇等 22 門，占課程總數 58%，其中文字學，中國文學研究、時事研究 3 門課程開 2 個學年。

1929 年成立的復旦大學新聞系，學制 4 年，共開設 45 門課程，其中一半以上爲相關知識類課程，包括文史知識、地理知識、軍事知識等等。

再看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 1943 年 4 年制課程基本上也大致如此。必修的一般課程有國文、英文、三民主義、政治學、經濟學、民法概論、理則學、西洋近代史、中國憲法、刑法、國際法、哲學概論、人生哲學、亞洲近代史、日本問題、蘇聯問題、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中國通史、社會心理學等 20 門，占課程總數的三分之二；必修的新聞專業類課程只有新聞學、新聞文學、採訪編輯、新聞英語、中國新聞史、世界新聞史、報業管理、出版法、社論寫作、編輯實務等 10 門。

1949 年以後，新聞教育「找學」的視野漸漸集中到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這從各新聞系科課程設置中可以看出。六〇年代，復旦大學新聞系提出「兩典一筆」（馬列經典、文學經典和寫作一支筆）的課程設置說法，明顯增加政治理論課和文史類課程。當時，該系的課程設置中，政治理論課程（不包括形勢與任務教

育)共766學時,占總學時的29%,文史類課程452學時,占總課時的24%,而新聞專業課程只有500學時,占總學時的19%;八〇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恢復招生、調整課程設置,在必修課中,政治理論課仍然占總學時到21.5%,文化基礎類課程(包括古代漢語、現代漢語、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等)占54.6%。新聞專業類課程為23.9%。主要用文學類課程進行新聞教育的傳統最早始於復旦大學新聞系。1929年,復旦大學新聞系成立之初,系主任謝六逸在《復旦大學新聞系簡章》中就明確地說:「社會教育,有賴報章,然未受文藝陶冶之新聞記者,記事則枯燥無味,詞章則迎合下流心理,於社會教育了無關涉。本系之設,即在矯正斯弊,從事于文藝的新聞記者之養成,既示以正確之文藝觀;複導以新聞編輯之軌則;庶幾潤澤報章,指導社會,言而有文,行而能遠。」這是典型的新聞技術加文學知識培養新聞記者的觀點。這種觀點和作法對中國新聞教育界的影響甚大,以至八〇年代後,新聞教育界有人據此提出了培養「作家型記者」的命題。

九〇年代以後,爲了適應社會的需要,有些新聞院系爲了使學生「知識面寬一點,適應面廣一點」,在教學中增加了世界政治經濟國際關係、中國經濟與市場、城市經濟學、統計學和大眾傳播學、公共關係學、新聞事業管理、廣告學概論以及電腦應用等類的課程。(方漢奇,2000:293-294)新聞教育「找學而教」的視野又放寬了許多,有人又提出培養「雜家型記者」。

我們無意評價「作家型記者」、「雜家型記者」這些命題的正確與否,我們只是肯定地認爲,中國新聞教育的傳統模式已經過時了,急需探索出一種新的模式,培養出適合時代需要的人才。

參、中國大陸新聞教育新模式的探索

1996年,隨著中國進入第九個五年計劃,中國新聞教育的發展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時期,即一些新聞院系開始走出傳統教育模式,並著手探索一種新的教育模式。

新模式的提出與探索同此時出現的兩件大事有密切關係。

第一件是傳播學在中國站穩腳跟並被導入新聞教育。傳播學作爲「舶來品」七〇年代後期被正式介紹進來,經過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道路。1995年6月,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究會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傳播學的研究不僅走出因「89政治風波」

出現的低谷，並且出現新的高潮；1996年5月復旦大學《新聞大學》編輯部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係」問題舉行學術研討會，會議分析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區別，並預測了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前景，這說明傳播學作為一門顯學被中國朝野所接受。也就是這一年6月，有關學者寫信給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將新聞學由二級學科提升為一級學科。次年，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修訂的研究生學位授予點專業目錄中，將「新聞傳播學」作為文學門類中的一個一級學科，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同年，教育部頒佈《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中，在「新聞傳播學」下，設有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廣告學和編輯出版學4個本科專業。這標誌著傳播學在中國已經取得了應有的學科地位，並將成為新聞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

第二件是大眾傳播媒介的變化。這一變化是因為因特網（網際網路）在中國的出現所引發的。

繼1993年9月《國家資訊基礎結構行動計劃》出臺後，1995年2月，美國政府正式提出《全球資訊基礎結構：合作日程》。為了在進入資訊化社會的時候不被拉下，中國和世界各國一樣，也加緊資訊高速公路的建設，繼1994年4月正式加入因特網後，1995年5月中國的網路建設進入開放性的商業化網路階段，所以當1998年5月聯合國新聞委員會正式提出第四媒體的概念時，中國的傳統媒體早已經紛紛搶灘因特網，在因特網上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一些記者，尤其是一些年輕記者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馳騁網上」，大顯身手。「網路新聞傳播」隨之成為最時髦的話語。

「網路新聞傳播」這一嶄新的傳播方式對新聞傳播人員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從業者應該是一種複合性人才，他們不僅有深厚的人文功底，系統的社科知識，還必須有掌握運用現代傳播工具的技能。而中國新聞教育傳統模式培養不出這種新型的新聞傳播人才。

於是，中國新聞教育新模式問題不僅被提出，而且在教育改革實踐中加緊探索。

首先是運用傳播學改造新聞學，以增加新聞教育的學術底蘊。其實，新聞教育出現之初，偏重術理層面技能訓練，中西皆然。但是，這種狀況在西方隨著傳播學創建並被導入新聞教育之後於20世紀六〇年代就結束了。在那裏，隨著新聞學向傳播學的發展，許多大學紛紛創辦傳播學或大眾傳播學系科，不少學校將原來創設的新聞學系科改為傳播學或大眾傳播學系科，確立新的培養目標、建立新的課程體

系和新的教學環節。

新聞學何以能發展為傳播學，傳播學的導入又何以能改變新聞教育學術底蘊不足的狀況呢？前一個問題在於兩者的相通，後一個問題在於兩者的相異。

關於兩者的相通，復旦大學新聞系的李良榮教授等在〈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一文中作了詳盡的分析（李良榮、李曉林，1998）：

首先是「資訊」。「資訊」是傳播學中的中心概念，社會資訊是傳播學研究的天然物件；「新聞」是新聞學中的中心概念，是新聞學研究的邏輯起點。「新聞」是「資訊」的一種，「新聞與資訊是一隊同質的相互交叉的範疇，這種同胞式的研究內容成為新聞學和大眾傳播學整合的必要前提。」

其次是「媒介」。新聞學是隨著新聞傳播媒介出現而興起的，它一開始就以報紙媒介為研究物件，故理論新聞學有稱為《報學》或《報館學》的，歷史新聞學有稱為《報學史》的，新聞編輯學開始為《報紙編輯學》；而「媒介研究」是傳播學研究的重點之一，不過，它不僅研究新聞媒介，而且所有的大眾傳播媒介。這就是說，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研究物件有重疊之處。

再次是「受眾」。大眾傳播學中「受眾」在新聞學中叫「讀者」、「聽眾」和「觀眾」，雖然兩者在各自的學科研究中所佔有的位置不同，但是他們傳播主體的物件，在這一點上他們有天然的聯繫。

關於兩者在學科上的差異性，華中理工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的屠忠俊教授亦有明確的論述（屠忠俊，1997）。

首先，學科屬性不同。新聞學屬於人文學科，是人文學中的應用學科，而傳播學屬於社會科學，是社會科學中的行為學科。人文學講究人文性，其主要體現著人對人自身的終極關懷，重點探討人的存在價值和人的精神表現，把諸如信仰、情感、道德和美等作為研究物件；其研究立場是主觀性的，其研究結論無可證偽。所以新聞學是學科，而不是科學。傳播學的導入，可以增加新聞理論的確定性，減少隨意性。

其次，研究是邏輯起點不同。如前所說，新聞學以新聞為邏輯起點，它關注的重點是新聞的採集、新聞作品的寫作、新聞產品的加工和新聞媒介的內部運作，包括媒介的功能、特點、新聞工作的原則等等，這就決定了新聞學操作層面的術理內容；傳播學以人類社會的傳播現象為邏輯起點，它關注的重點是媒介與社會的互動，即社會對媒介的作用，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尤其是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受眾」和「效果」上。這就使得傳播學具有多學科性。傳播學是政治學、社會學、心理

學、教育學等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交叉的產物，它從這些學科中借鑑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建構和方法形成。所以，傳播學的興起雖然比新聞學晚得多，但是它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新聞學導入傳播學，新聞學可以把傳播學中有關理論，如「受眾理論」、「效果理論」、「媒介理論」等「拿來」，為我所用，增強自己的學術底蘊和理論功底。

再次，研究的方法不同。如前所說，新聞學屬於人文學科，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的方法、思辯的方法；傳播學屬於社會科學，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的方法、實證的方法。前者有明顯的主觀色彩，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色彩；而後者則突出客觀性、確切性和可操作性。所謂客觀性主要指資料的收集、資料的解釋都一事實為依據和歸宿，切忌研究人員帶進個人偏見；所謂確切性主要指理論命題所涉及的概念都有嚴格的定義，並能通過概念指標予以測量；所謂可操作性主要是指有一定的程式和嚴格的操作方法，這種程式過程和操作方法只有經過嚴格專業訓練的人才能進行作業，並且按這套程式和操作方法，在同樣的程序控制條件下能得到同樣的結果。科學的研究方法使得傳播學不僅有比較系統的理論體系，而且有比較成熟的學科體系。這正是新聞學所缺少的。

實際上，中國對傳播學的引進，最初的動機就是改造傳統新聞學，增加新聞學的學理成分，促進新聞事業（包括新聞教育事業）的發展。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以驚人的速度向前發展，大好的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勢要求新聞學的研究和新聞事業的發展應有新的突破，新聞學研究必須解放思想，把研究的視野投向更廣闊的天地，新聞傳播媒介不僅發揮政治宣傳功能，而且應發揮資訊傳播功能和群眾娛樂功能，成為社會大傳播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但是傳統新聞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與此不相適應，於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傳播學。1984年至1988年，中國傳播學研究出現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導入西方傳播學，吸取傳播學中的合理內核，改造中國傳統新聞學，這是當時大多數研究傳播學人士的想法。1984年何微先生寫的〈面向未來改革新聞教育〉一文代表了這種觀點：「傳播學在世界上已引起不同程度的重視，我國也有人在研究，並沒有這樣的專業。現在處於介紹、瞭解、研究階段。有的研究者斷言：傳播學重視理論研究，而新聞學重視業務研究；傳播學以『學理』為重點，新聞學以『術』為重點，新聞學是站在新聞業務圈子內研究新聞工作的，所涉及的問題只是新聞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即傳播者單方面的問題。它不是從社會整體上去考察新聞事業，也沒有或很少將新聞傳播的物件——讀者、聽眾、觀眾列入研究領域內。暫不去評論此種觀點，理應首先感謝他

提醒我們，應進行新聞學與傳播學的比較研究，先把他們的相似和差別的特徵確定下來，更進一步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起內在的過程，深入到被比較的現象的本質，揭示它的產生和演變規律，從而正確地認識傳播學。」（《中國新聞年鑒》，1985）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人民的思想進一步大解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仍然是封閉狀態的新聞事業與此顯然不相適應，九〇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又一次出現高潮。這次高潮，不僅表現在對傳播學的系統介紹，而且表現在著手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學體系，尤其運用傳播學的理論和方法改造中國傳統新聞學，初步創建出一門新的學科——「新聞傳播學」。

其次是導入電腦、電信等學科，實行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大跨度交叉，增加新聞教育的科技含量。如前所述，電腦網路的運用不僅改變了記者採寫方式，也改變了編輯的編排方式。「一支筆、一張嘴的記者」會被淘汰，在紙上畫版的編輯也會被淘汰。因此，增加科技含量，使學生掌握一定的現代傳播技能，成為新聞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這一方面的探索，一些以理工科為主的高等學校的新聞院系動作較早，技術和經費投入的力度也較大，取得的成效也比較顯著。

傳播學的創始人施拉姆（Schramm, Wilbur）早在 1957 年春季號《新聞學季刊》上發表文章，指出新聞學研究的四個趨勢：由無定量處理轉向定量處理；由人文方法轉向行為科學方法；由著名人物的研究轉向過程和結構的研究，對新聞出版和新聞出版制度以世界性的關注視角進行研究（屠忠俊，1997）。施拉姆的四個趨勢，前三個從方法和內容的角度指出了新聞學向傳播學發展的過程中的學科交叉趨勢——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交叉，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不過，當時，施拉姆只是指出了人文學科與行為科學的近距離交叉，指出了人文社科與心理學、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等方面的軟交叉，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資訊化時代的到來，傳播學必然會提出與電腦、電信等自然科學大跨度硬交叉問題。所以，導入自然科學，實行學科交叉不僅是培養新聞人才知識結構和技能結構的需要，也是新聞學、傳播學學科發展的必然。

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現在在中國新聞教育界，除了傳統的教育模式之外，已經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教育模式：倡導學理與術理並重，傳播文化與傳播科技結盟，培養既有比較深厚人文功底，又有比較系統社科知識，還能掌握現代傳播技能的複合型的新聞傳播研究和實務人才。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讀這一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新模式：

第一，新的培養目標。如前所說，傳統的新聞教育的培養目標簡單而又明確：

主要是爲了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的採、寫、編、播工作的需要，通過專業知識的講授，職業技能的訓練，培養新聞傳播的實務人才。新的教育模式是要培養複合型的新聞傳播人才。所謂複合型人才，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立體性，即既有深厚的人文功底、紮實的傳播理論基礎，又掌握現代傳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採編與製作於一身，一人抵幾人用；同時，新聞教育不僅培養新聞傳播業界的從業人員，也、還培養新聞傳播學界的研究人員。

第二，新的培養途徑。主要有三：

其一，從單學科教育轉向多學科綜合教育。如前所述，中國新聞教育在傳統模式下，都是一種單學科教育，即偏重人文學科的教育。雖然八〇年代中期以後，不少學校的新聞學科在教學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增設高等數學、傳播學和一些電腦類課程，但仍然是人文學科的教學體系。新的教育模式下，爲培養複合型人才的需要，必須實行新聞學與傳播學並重、傳播學理與傳播科技結盟的戰略，從單學科教育轉向多學科綜合教育。學生在學校不僅要接受文、史、哲等人文學科教育，接受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行爲科學教育，還要接受電信、電腦等自然科學方面的教育。

其二，從側重技能訓練轉向學理教育與技能訓練並重。如前所述，新聞學是屬於應用性文科，採、寫（攝）、編、評（播）是新聞學教育的主要專業課，是新聞學專業學生的看家本領。這種側重技能訓練培養出來的學生功底不深。我國新聞學界的有識之士，對此已經呼籲有年，希望新聞院系加強對學生的理論修養，夯實學生的理論基礎，但是由於傳統新聞學自身的原因，側重技能訓練的教育模式不可能根本轉變。傳播學的導入，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學理教育主要是指傳播學理論和方法的教育。

同時，網路傳播對從業人員技能方面的要求也很高，新聞教育對學生的技能訓練一點也不能放鬆。不過技能訓練的內容完全變化了，網路採訪、電腦寫作、電腦編排、網路協統編輯、網上搜索與網路傳輸等是技能訓練的基本內容。

其三，從廉價教育轉向高投入教育。傳統新聞教育劃歸純文科教育。一般來說，文科教育大都爲廉價教育，不需要多少投入，甚至不需要投入，就可以辦起來。教師有一個本子一支筆就可以備課，有一支粉筆，一個黑板就可以授課，學生帶著兩支耳朵就可以聽課，頂多做點練習，搞點實習就可以畢業了。

廉價教育的觀念對新聞學專業來講，其實早就過時了，不要說廣播電視專業，攝、錄、編、播等教學環節需要「重裝備，高消耗」，就是傳統的報學專業，在印

刷告別了「鉛與火」、採用電子編排、雷射排版之後，新聞教育就已經步入投入教育範疇了。

如果說，網路傳播出現之前認為新聞教育是廉價教育的觀念是落後的話，那麼，網路傳播出現之後，依然抱著「廉價教育」的觀念不放的話，則是有害的。因為，面臨互聯網的挑戰，三大傳統媒體紛紛採取了與之結盟的措施：報紙出「網路版」，廣播、電視紛紛搶灘上網，學生在學校如果不學習和掌握一定的相關知識和技能的話，畢業無疑等於失業。因此，辦新聞教育，必須有「投入」的觀念，必須有一定的經費投入，必須有一定的實驗手段，必須加強實驗基地的建設。

第三，新的課程體系。為適應新的培養目標，必須重構課程體系。重構課程體系的指導思想是「兩加強一弱化」，即加強新聞傳播學類的學理課，加強現代傳播科技類的應用課，弱化傳統新聞學類的專業課。在課程體系的建設上體現出綜合性，以增強學生畢業後的適應性；加大選修比例，以增強學生學習的能動性。

肆、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發展思考

進入新世紀，中國大陸新聞教育一定會繼續發展。與上個世紀八、九〇年代的發展相比較，今後一段時間內，中國新聞教育的發展會出現以下特點：

第一，規模上會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如前所說，上個世紀的八〇至九〇年代，中國新聞教育在規模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按照一般規律，任何事情在經歷一次大發展之後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從中國新聞教育發展的自身情況看，除了會遵守一般規律外，還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首先，雖然從世界範圍的角度講，傳播業與電信業有交融的趨勢，但是中國的國情決定了這種交融不可能在近期有明顯的進展。這些情況必然對新聞教育規模發展產生一定的制約。

其次，中國新聞事業政治性使得新聞從業人員的政治素質遠遠高於業務素質，黨報的特殊要求決定了宣傳紀律高於新聞規律，這樣就使得新聞從業人員似乎不需要學習太多的新聞傳播的專業知識，只要政治素質好，「初通文墨」就可以了。而這種狀況在短時期不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

第二，新聞教育在走向市場的過程中，在市場規律的支配下，必然會「優勝劣汰」。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上個世紀八、九〇年代新聞教育機構急劇膨脹，毋寧諱言，這些新辦的新聞教育機構中，有一些一無必要的專業教師，二無必要的實驗

條件。在全國人民「提高教育質量」的呼聲中，新聞學專業的整頓首當其衝。每個新聞院系如何使自己不被「整頓」掉，如何使自己變「優」而在激烈地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是一個十分嚴峻的不可回避的問題。雜牌混戰之後，就是名牌淘汰雜牌。這就是市場規律。

第三，中國新聞教育會出現多元化格局。上個世紀，中國新聞教育形成了「南北兩鎮」的格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和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在中國新聞教育界是兩個「超級大國」，處於「霸主」地位。進入新世紀，這種情況會有所改變。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取代單一的傳統教育模式，會使原來處於「第三世界」的新聞院系有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傳播學的研究尚處於引進消化階段，新的教育模式的探索還剛剛開始，因此，在這場新聞教育改革中，大家基本上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上。千帆競發，百舸爭流，誰勝誰敗，就看誰能抓住機遇，強佔先機。20世紀九〇年代後期，北京廣播學院新聞學院的迅速崛起就是一個例證。

第四，中國的新聞教育改革，儘管沒有一定之規，但是，根據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趨勢和發達國家的經驗可以肯定一點，就是「中文系辦新聞學專業」和「中文系教師教新聞學課程」的傳統勢必會改變。在中國，「中文系辦新聞學專業」和「中文系教師教新聞學課程」是個傳統。20世紀二〇年代，復旦大學新聞學專業就首先設在中文系。1949年以來，大陸不少新辦的新聞學專業，繼承了這個傳統。1953年北京大學新聞學專業開了這個頭，後來的「率由舊章」，照此辦理。六〇年代，普通高校創辦新聞學專業的有5個，其中4個就是由中文系設置的。七〇年代，普通高校創辦新聞學專業的有3個，其中2個是由中文系設置的。八〇年代，普通高校創辦新聞學專業的有30個，其中有23個是中文系設置的。即使像武漢大學新聞專業，雖然一開始便獨立建系，在行政建制上似乎與中文系沒有什麼聯繫，但是從系主任到教師基本上都是從中文系中分離出來的。再加上發展速度快，原有新聞專業少，畢業生都直奔效益好的新聞實務界，很少有願意在教育界工作的。怎麼辦？中文系的教師教新聞學專業成為一時的風氣，從基礎寫作課，到新聞史論課，甚至到新聞採、寫、編、評等業務課，都是由中文系的教師來擔任。新聞學專業屬於文學門類，新聞學專業的畢業生授予文學學位。這種學科分類缺乏科學依據。所以，為了使我們的學科分類與國際接軌，2001年國務院學位辦關於修訂學科目錄徵求意見稿將新聞學和傳播學作為兩個一級學科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並列地放在社會科學類。學科的科學分類，為新聞教育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的的規範。

伍、結語

本研究屬於歷史研究，以中國新聞教育的發展歷史為研究物件，用文獻檢索的方法，在詳細考察了中國大陸 80 多年新聞教育的發展史之後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中國新聞教育在 20 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以前，都是單一的傳統模式，只是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後，才開始探索新模式。

在此基礎上，筆者對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的傳統模式進行了理性分析，不僅分析了其形成原因，而且評析了其利弊得失。這種分析的意義在於找到長期存在於中國大陸的「新聞無學」論調的學術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新聞教育由於「無學理課程可教」，只是停留在採、寫、編、播的技能訓練的層面。在一般人看來，新聞人才的培養似乎不需要進行系統的學術訓練，只是辦辦短訓班、速成班就可以。新聞學不被承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甚至連學科歸屬都不明確，一時劃歸法學類，一時有劃歸文學類。

香港新聞教育界的權威人士朱立博士曾尖銳地指出：「新聞傳播工作的『形』——編、采、寫、制，當然應當教，但絕對不應該只以之為唯一的內容，而必須有其他專精的學科配合」，「它們一定得以專業的知識、宏觀的通識和操守的陶冶為基礎，缺乏了這些，充其量也只是掛了大學招牌的職業訓練而已！」（朱立，1988）

中國大陸大學裏的新聞教育的傳統模式正是朱立博士所說的「掛了大學招牌的職業訓練」。新聞教育的這種弊端，致使「新聞無學」的論調，不僅在中國大陸長期存在，而且嚴重地困擾著學界和業界。在學界，似乎無論誰，無論他原來是什麼學科背景，也無論他以後是否系統進修過新聞傳播的課程，有無這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堂而皇之發表新聞學的學術論文，甚至可以充當新聞學專業的教師，給新聞學專業的學生授課；在業界，似乎無論誰，無論他原來是什麼學科背景，也無論他以後是否系統進修過新聞傳播的課程，有無這方面的知識，都可以幹新聞工作，都可以當記者、編輯，甚至可以領導一個新聞媒體的工作。

筆者此項研究的目的，在於發出一個呼籲：中國大陸的新聞教育必須衝破傳統模式，必須改變「掛了大學招牌的職業教育」的形象，進而解決「做新聞工作不需要專門知識」的問題。為此，筆者以為，首先必須變「新聞無學」為「新聞有學」。如前所述，新聞學是以新聞事業為研究的邏輯起點，它只是告訴新聞從業人

員怎麼樣做，新聞工作的「形」是其關注的中心和重心，所以，從「新聞學」本身很難挖掘出學理性的東西。於是，筆者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導入傳播學改造新聞學，以增加新聞教育的學術底蘊，並對如何導入傳播學問題作了比較詳細論述。

本文還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要進行新聞教育新模式的探索。這個命題的提出，是在前面「破」的基礎上的「立」。這個命題的提出，從表面上看是新聞教育發展的需要，從深層次看是進入資訊時代，新聞傳播業發展的需要。

筆者結合自己所在的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新模式探索的實踐，深入論述了「兩導入，兩增加」（導入傳播學以增加新聞教育的學術底蘊，導入電腦、電信等自然科學，以增加新聞教育的科技含量）做法。這種新模式的建構，既加強了新聞教育學理成分，解決了「新聞無學」的問題，又沒有否定新聞教育中術理成分的重要性，並且把術理教育和技能訓練提高到現代化的層面。在關於「新的培養途徑」的論述中，具體論述了「三轉變」——「從單學科教育轉向多學科綜合教育、從側重技能訓練轉向學理教育與技能訓練並重、從廉價教育轉向高投入教育」，使新模式的論述，不只是一種理論設想，而是有較強的可操作性。

參考書目

- 丁淦林（1997）。《大學新聞教育的培養目標與課程體系應該怎樣確定？》。《新聞大學》冬季號。
- 方漢奇（2000）。《新聞史的奇情壯彩》。北京：華文出版社。
- 《申報》（1933年1月5日）。《申報函授學校章程》。
- 《申報》（1934年）。《申報函授學校概況》。
- 朱立（1988）。《大學新聞教育往何處去？》，《潮流月刊》第11期，1988年10月出版。
- 李良榮、李曉林（1998）。《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大學》，秋季號。
- 何微（1984）。《面向未來改革新聞教育》，《中國新聞年鑒》，1985出版。
- 張友鸞（1982）。《世界日報興衰史》。重慶：重慶出版社。
- 童兵（1999）。《中西新聞比較論綱》。北京：新華出版社。
- 屠忠俊（1997）。《關於新聞學研究轉向傳播學研究的淺見》。《新聞學探討與爭鳴》，夏季號。

趙玉民（1999）。《中國新聞教育和研究八十年》。《現代傳播》1999 年第 2-3 期。

顧執中（1985）。《戰鬥的新聞記者》。北京：新華出版社。

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Developing Thinking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Ting-jun Wu*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mainland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80 years and it concurred remarkable changes. However, the educational mode is only a single and traditional one and it has an obvious shortage--lacking of an atmosphere and technology content in academic study. In the mid 1990s, there was a new exploration in this area: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natural science were introduced. Following changes will appear as: the single mode will be substituted by a pluralistic pattern; the situation that "Chinese department runs journalism" and "teachers from Chinese department lectures the journalism courses" will change inevitably.

Keywords: Journalism Education, mod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China-Mainland

* Dr. Ting-jun Wu is Professor and Dean in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